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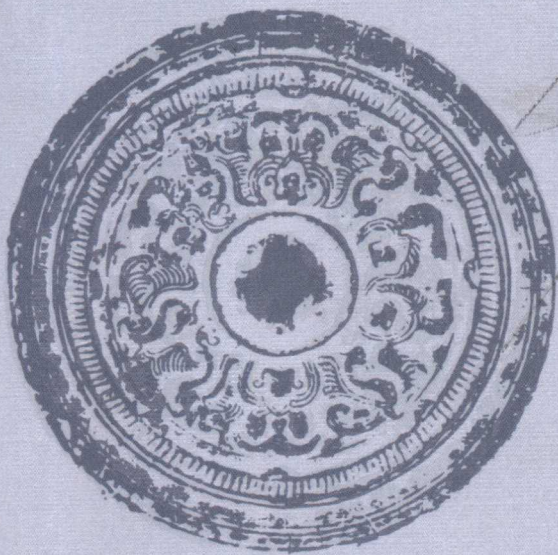
天下论从 Tianxia Luncong

Di Yilan Wen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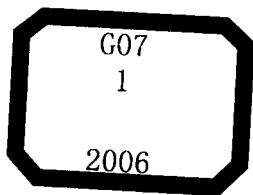
地缘文明



阮炜著



上海三联书店



地缘文明

阮 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文明/阮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5

(天下论丛)

ISBN 7-5426-2315-X

I. 地... II. 阮... III. 文化地理学—世界
IV. 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247 号

地缘文明

著 者/阮 炜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25 千字

印 张/20.5

ISBN7-5426-2315-X

C·151 定价 36.00 元

“地缘文明”释义

“地缘文明”有两个用法：

1. 从地理—自然的角对特定“文明”的精神品质、历史—现时表现，以及未来走势进行分析，或者说，对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长时段、结构性的影响加以探究；

2. 对特定民族、国家或“文明”之间存在的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逃避的毗邻关系进行描述，进而对古往今来人类共同体之间因先天性毗邻关系而发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互动或这种互动的可能性加以讨论。

“地缘文明”里“文明”的含义基本上是清楚的，^[1]而“地缘”则不是那么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缘”字含义丰富，有“缘分”、“因缘”、“机会”等义。尽管“地缘”一词译自英语、法语、德语（及其他西方语言）里的“geo”，但严格地讲，无论哪一种西方语言里都没有“地缘”概念，因为西语里压根儿就没有“缘”或“缘分”之概念。西方语言中有的只是geo。这是一个常见的构词前缀，有土地、地球、地质等义，源自古希腊语的γη，而γη有土、土壤、土地、家等基本词义。

尽管西语中的geo没有“缘”、“因缘”、“缘分”之类的概念，并不等于西方学界所认知的事物之间不存在“缘”、“因缘”或“缘分”一类的关系，只不过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尚未认识到这类关系。当现代西方人使用“geo-politics”、“geo-economy”或“geo-culture”一类的复合概念时，他们显然讲的是特定土地或空间位置与相应人类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因果关系或“缘分”。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用“地”字再加西语中并非存在的“缘”之词义来翻译geo，甚为精当（这表明现代汉语是富于创造力的），因为“地缘”一词把西方人认知模式中一种本来就存在，但尚未在语言文字得到反映的事物间关系凸显了出来。

既然“地缘”的意思是“地理缘分”（或“地理因缘”），那么所谓“地缘

文明”只应是这么一种尝试：从地理缘分的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描述和分析。

注释：

[1] 对于本书作者来说，“文明”一词具有生命形态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层意思，本书甚至专门用第二章的整个篇幅来阐发这两层意思的区别。进行这种区分对于本书的立论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这种区分，“地缘文明”的概念很难立足。

目 录

- 1 “地缘文明”释义

- 1 第一章 绪论
 - 1 一 使用“地缘文明”概念的理由(I)
 - 6 二 使用“地缘文明”概念的理由(II)
 - 11 三 “地缘文明”的内涵
 - 17 四 地缘文明的划分

- 26 第二章 “文明”的两个含义
 - 26 一 作为文化形态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定义
 - 28 二 文化形态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 34 三 相关历史事实
 - 38 四 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

- 42 第三章 文明的规模和同一性
 - 42 一 事物是否有一种可把握、可体认的规定性?
 - 43 二 “文明”是否有一种可把握、可体认的规定性?
 - 48 三 自然条件对于文明规模和同一性的重要性
 - 52 四 地缘—自然环境对于文明规模和同一性的重要性
 - 59 五 地缘—自然环境对于文明同一性—主体性的重要性
 - 64 六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与张祥龙先生讨论

- 77 第四章 文明的性格
 - 77 一 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缘—自然条件
 - 80 二 文明性格的地缘—自然背景
 - 84 三 地缘—自然环境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性格特征

- 91 四 叙利亚型文明非是即非思维模式的后果
- 95 五 地缘—自然环境与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性格
- 101 六 文明性格中蕴含的能量
- 108 **第五章 文明的空间运动**
- 108 一 何谓“文明的空间运动”
- 110 二 空间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
- 113 三 空间意义上的文明互动
- 116 四 地缘—自然环境和文明规模对于文明互动的重要性
- 119 五 空间运动中的文明同一性和主体性
- 122 六 地缘—人口意义上的文明扩张
- 126 七 表现为宗教形式的文明扩张
- 129 八 表现在海外华人身上的文明扩张
- 131 九 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文明扩张
- 136 **第六章 文明互动中的现代性**
- 136 一 现代性的内涵及可播散性
- 141 二 现代科技并非西方文明独立开出
- 144 三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西方独立开出
- 150 四 宪政民主并非西方独立开出
- 160 **第七章 地缘视域中的文明和政治行为体**
- 160 一 使用地缘视角的理由
- 163 二 地缘眼光的审视：东南亚、中国、日本、朝鲜
- 169 三 地缘眼光的审视：西亚北非、地中海、西欧
- 173 四 地缘眼光的审视：俄罗斯

-
- 180 第八章 边缘与中心
- 180 一 边缘与中心的形成
- 182 二 边缘而中心运动的史例举证
- 186 三 地缘政治学的考量
- 190 四 世界体系论的考量
- 196 第九章 东亚共同体
- 196 一 中国:传统东亚政治的中心
- 200 二 日本:另一个核心国家
- 203 三 日本的挑战与传统东亚政治秩序的崩溃
- 207 四 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
- 211 五 东南亚华人
- 213 六 东亚的整合:历史与现时
- 216 七 东亚整合进程中的东盟、中国、日本
- 220 八 东亚整合进程中的中日关系:
让历史积怨让位于国家利益
- 226 九 东亚对蒙古、中亚三国、俄罗斯远东和澳大利亚的
经济整合
- 229 附录:酝酿中的“大东亚”
- 236 第十章 文明、地缘文明、全球化、全球文明
- 236 一 文明是打破局部认同的结果
- 238 二 文明和普世性宗教在冲突—融合中成长
- 241 三 文明的扩张是全球化的预演
- 243 四 技术革命是全球化的引擎
- 246 五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表征

- 250 六 全球经济文化与经济全球化
254 七 全球化情境中的“大认同”与“小认同”
258 八 主权的相对化
262 九 “硬件”的全球化与“软件”的全球文明

272 链接

272 第一章

- 272 {链接 1} 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机理
273 {链接 2} 关于地理决定论的讨论
274 {链接 3}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275 {链接 4} 文化气质与特定地缘环境的结合
276 {链接 5} 距离所导致的利益相关性差异
276 {链接 6} 中国人口在低平地带的集中分布
278 {链接 7} 基于土地而非血缘的人类合作
279 {链接 8} 欧盟将按自身的节奏继续前进
280 {链接 9} 拉丁美洲不再是美国的后院

281 第四章

- 281 {链接 1} 西方历史上对基督教“异端”的迫害和残杀
282 {链接 2} 西方历史上因思想抵牾而杀人之事举例
282 {链接之链接 a} 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
283 {链接之链接 b} 十字军对阿尔比教派的镇压
283 {链接 3} 皮萨罗的西班牙远征军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
285 {链接 4} 从美国保守派的好战言论看西方人非是即非的思维方式
286 {链接 5} 郑和舰队的巨大规模及其文明史意义

290	第五章	
290	{链接 1}	宋代中国的经济成就
291	{链接 2}	佛教早期历史上的“结集”和传教
292	第六章	
292	{链接 1}	民族国家现象的跨文明考察
294	{链接 2}	何谓“人口规模”
295	{链接 3}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中的行会
297	第九章	
297	{链接 1}	科举制度兴起的经济—政治原因讨论
298	{链接 2}	日本课本中有不少中国内容
299	{链接 3}	推动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I)
299	{链接 4}	推动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II)
299	{链接 5}	“歉意”与“道歉”
300	{链接 6}	中日应向法德学习什么?
300	{链接 7}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日应消除敌对,面向未来
300		一 从日美“安保条约”看东亚病局
302		二 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牌可打,日本是王牌
304	{链接 8}	俄罗斯媒体谈俄远东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304	{链接 9}	日本舆论界谈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
304		一 中国摸索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305		二 青木保谈东亚共同体

307	第十章	
307	{链接 1}	可疑的“中央文明”概念
309	{链接 2}	历史上不同民族认同同一个政治实体之情形
310	{链接 3}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异同
311	{链接 4}	泛滥在美国卡通片和电子游戏中的暴力
311	{链接 5}	关于文明多样性与历史统一性的思考
316	后记	

第一章 绪 论

一 使用“地缘文明”概念的理由(I)

既然本书结构性地使用“地缘文明”之概念,便得交待一下使用它的理由。在陈述这些理由之前,不妨先看看“文明”概念本身。

据说“文明”一词有一百多个词义,譬如作为“文化”同义词的“文明”,譬如“精神文明”之“文明”,再譬如“文明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专指自西方输入的话剧,与中国传统戏剧相对。在当时国人看来,西方话剧是“文明”的,传统戏剧是“不文明”的)之“文明”等等。梳理词义并不是本书作者的兴趣所在。在本书作者看来,所谓“文明”有两个基本含义:(1)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2)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

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是一种思维样式,或信仰样式,或者说是一种存在形态、一种生活模式、一种风格或品质,是一个为特定气质或品格所支配的长时段的动态结构;^[1]而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则是兼有特定思维或信仰形态、存在形式、生活模式或兼有特定生命气质或性格的大型人类集团。^[2]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即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而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即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包含这么一个基本预设:它不仅建立在特定的生命形态(譬如价值观、风俗、习惯、文学、文字、艺术、制度安排、建筑样式等等)的基础上,更建立在至关重要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之基础上。换句话说,文明研究应当采用一种空间性或地缘性的视角,不仅要考察特定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样式和历史主体性,更要考察特定的空间位置、地理形态和自然条件等等对特定历史文化共同体所产生的及可能产生的长时段、结构性的影响。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视角?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特定“文明”或大型历史文化共同体享有

特定的空间或疆域覆盖范围,用技术一点的话说,“定位”于特定的纬度和经度。但更为重要的是,“文明”拥有特定的地缘—自然环境。正是地缘—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命运或历史—现时表现,影响了该文明的精神品质或属于该文明的人们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地缘—自然因素塑造了一个文明本身。所谓“地缘—自然因素”,是特定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集合,不仅包括地貌和地形,如山脉、丘陵、谷地、河流、海岸、沙漠、高原、平原、湿地等,也包括气候(其中降水量是否充足、降水是否大致均匀尤其重要)、水文、森林、草原、动物、植物等,更包括各种矿物资源。一个处于萌生阶段的人类文明是否享有充足且均匀的降水,是否享有适宜的温度(所谓“适宜的温度”,是指特定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既非太高,譬如 28 摄氏度以下;亦非太低,譬如年平均气温在 18 摄氏度以上),有没有经过一定的劳动改造后便适合耕种,或便有较高产出的大片土地,有没有易于开采冶炼的铜、锡、铅、铁、金、银、锑之类矿藏,将从根本上决定该共同体的生存形态和未来命运。
{链接 1}

正是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使中非森林中的居民长期以来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使中亚草原上的居民过着游牧生活。正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家阿·德芒戎所言:“在干旱地区,泉水和村庄的位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高山地区,在稀少的、坡向好的小片沃土和人类住所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从文明发展的观点来看,在位于大陆半球中心的欧洲和孤悬在辽阔海洋中的澳大利亚之间,不是有着深刻的差异吗?半岛与岛屿,难道不有助于形成某些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吗?葡萄牙之所以与西班牙分离,难道不能部分地用它西方面向大洋,东方与西班牙隔着崎岖山地及荒凉峡谷来解释吗?”^[3] {链接 2}毫无疑问,地理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个论点用问题的形式来表述也许更有力:为什么各大文明诞生在北纬 23 度至 40 度之间?为什么自文明诞生至工业化开始的 18 世纪,世界人口的 70%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这一总面积仅 1100 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4]这显然是因为这一地带有充足的降水、适宜的气候和适合农耕的土地。纵观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世界人口分布呈现出这么一些规律:(1)暖湿地区(温带、亚热带)人口高度集中,而寒带和干燥地区的人口稀少得多,过于炎热和潮湿的热带地区人

口也相对稀少；(2)大河流域集中了大量人口，例如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沿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印度河等大河兴起的；(3)人口趋于集中在低平地区：“海拔 200m 以下的陆地占总面积(不包括永久冰盖)的 27.8%，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却占全世界的 56%；200—500m 的陆地面积占 29.5%，人口为 24%；500—1000m 的陆地面积占 21.5%，人口为 12%；而 1000m 以上的陆地面积占 27%，人口比重仅为 8%。”^[5]{链接 3}当然，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人类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便越大。尽管如此，以上人口分布特点的描述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现代社会。

以上所讨论的，是使用“地缘文明”概念的最重要的理由。其实，尽管国内国外尚没有任何其他论者使用“地缘文明”这一概念，但已经有人明确地从地缘的角度来审视文明。例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看来，影响一个文明的精神气质最根本因素，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土地及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类，以及自然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讨论文明也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利用这些基本条件的：农业、畜牧、食物、居所、衣着、交通、工业等等。”^[6]这种空间视角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一个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是为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这里，布罗代尔试图在文明所处的地缘自然环境与其精神性格和历史现时表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与他恰成对照的是，更“主流”的文明论者或“历史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索罗金、奎格利、墨尔科等人——根本不探讨文明气质形成的原因，而是径直把人人都能观察到的文明特质当作立论的根本出发点，或一个人都应接受的假定，一个无需讨论的前提条件。

“主流”文明论者的进路显然是有缺陷的。若采用他们的“文明”概念，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的文明类型将显得异常复杂，几乎不可能归类。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个外来文明不断进入，直至今日也仍然在施加影响。以东南亚为例。这个地区各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大致相同，都处在热带(及亚热带)，都沐浴着丰沛的季风雨，都一年一度地遭受台风袭击，都被海洋所包围(印度尼西亚有“万岛之国”之谓，菲律宾也由成百上千个岛屿组成)，都发展了与航海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它们的历史经验也相似，自古以来

就是多个外来文明的竞技场。早在公元纪年开始之前,印度人便将佛教传入这个地方。在稍后或大约同一时期,中国人也开始了与东南亚的商贸往来,并移民到那里(最初的规模当然很小,较大规模的移民发生 16 世纪以后)。15 至 16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近代以来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殖民,二战期间又有日本人的占领,1960 至 1970 年代甚至有苏联的染指。然而没有一个外来文明最终完全胜出,取得压倒性胜利。若采用传统的分明概念和分类,东南亚显然是异常棘手的。它到底属于哪个文明?如果采用一种地缘—自然视角,东南亚的情况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其历史上存在过的诸多政治实体受到不同文明作用,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此消彼涨的复杂画面,顿时被统一在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中,即相同的地缘—自然环境及相似的历史命运。

同样的,某两三个甚至更多相互毗邻的人类共同体虽可以被归类为不同的“文明”,但如果撇开表层意义上的差异,撇开传统的或“主流”的文明分类,则这些人类共同体很可能享有一种深层意义上的相似性,或共同的“文化基因”。例如近一百年来,论者们普遍认为存在着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这四个独立的“文明”,而划分出这四个文明的最重要依据是不同的宗教,即西方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7]然而,相同或差异毕竟是相对的。虽然这些宗教被给予不同的名称,虽然它们各自都构成了巨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都拥有庞大的信众人口,可一旦把它们与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宗教加以比较,它们之间无可否认的家族性相似便立即凸显出来。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四大宗教及相应的文明都结构性地兼有叙利亚和希腊文明要素,^[8]而共同的文化基因恰恰源自它们共同的地理缘分。从空间的角度看问题,这四大宗教及相应的文明都起源于同一个地缘世界,即西亚—地中海世界(在两河流域和邻近的尼罗河流域,文明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便诞生了;公元前 15 世纪上半叶,埃及法老图特莫斯三世对西亚频频用兵,^[9]自此,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开始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及至公元前 6 世纪上半叶,波斯人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把这两个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此可以说,两个地区深刻而富于成果的文化融合进程开始了;公元前 4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原本位处边缘的半希腊化的马其顿王国征服了希腊世界,此后

更征服了埃及和整个西亚,建立了庞大的希腊帝国,这就使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最终使建基在叙利亚和希腊文明整合之上的三个新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文明得以形成)。

应特别注意的是,属于特定文明的人们既然与特定的地缘—自然环境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投注就必然与他们生活其中的地缘—自然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链接4}可以说,他们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地缘—自然环境,产生于他们与地缘—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产生于他们与特定自然和人文地点如山脉、河流、平原、谷地、城市、广场、教堂和庙宇等等的有机结合。换句话说,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同一性或“身份”、“认同”与其所处的地缘—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纠缠在一起,或者说,“有赖于人类和生物本性之间关系的性质,其中的生物本性既包括种族和血缘的,也包括土壤和国土的。”^[10]{链接5}在文化认同、宗教信仰或“民族感情”的意义上,属于特定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人们会崇拜特定的自然或人文地点,并拥有与这些地点紧密相连的、使其“文化身份”得以确立的记忆、符号、神话和其他遗产。也正是由于源自这些特殊地点的精神要素是文化身份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人们会本能地捍卫这些被叫做“文化”的记忆、符号、神话、习俗和其他遗产,使它们制度化、仪式化、永久化(尽管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将根本排斥外来文化要素)。全世界穆斯林对麦加天房的朝圣,全世界犹太人对圣城耶路撒冷的神圣情感,全世界中国人或华人对祖坟的拜祭和对祖屋、祖先牌位所在地的特殊情感,印度教徒对圣河恒河的虔敬和崇拜等,都不可简单地用“宗教行为”或“宗教感情”一类的描述来打发掉,而应视为具有某种特定精神形态的人类藉着某种特殊地点来表达其文化品格或身份的方式,或藉着特殊地点来重申其本体论意义上的“我是谁”或“我是我所是”的手段。从本质上讲,1949年以来,中国公民对天安门广场的特殊情感与以上描述的“宗教行为”是相似的。

在长达两三千年的“离散”中,散居欧洲、北非等地的犹太人经历了同民族诞生地巴勒斯坦失去空间联系的痛苦。为了维系其文化同一性,犹太人在民族心灵中培养了对圣城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的狂热崇拜,这不啻是把空间因素纳入文化身份的建构中,使之成为犹太人文化

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为了维护其文化同一性,犹太人还发展了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排他意识,这集中地体现在极端化的唯一神信仰和相关教义、族内婚传统、割礼这一人为制造的生理符号等方面;此外,以拉比为骨干的读经释经活动和种种崇拜活动,以及独特的风俗、礼仪和节庆[除割礼以外,还有成丁礼、赎罪日、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也加强了犹太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尽管心理意义上民族空间不是实然意义上的民族空间,但起到了维系民族文化身份的作用,对历史上犹太人“保文保种”贡献极大却是无疑的。及至 20 世纪,因缘合和使犹太人恢复或部分恢复了祖先的土地,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家。目前,在维系其身份方面,散居全世界的犹太人不仅有传统唯一神观的心理要素和独特风俗、礼仪和节庆可以依赖,更有建立在实然领土上的犹太国家可以依恃。但是应当看到,同其他文明相比,犹太人建构和维系其文化身份的故事是非常独特的。更常见的情形是,一个民族或文明的同一性从来就与特定的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想象,数千年来其同一性与南亚次大陆紧密相连的那个文明一旦失去了南亚次大陆,还能否叫做印度文明;数千年来其同一性与黄河和长江流域紧密相连的那个文明一旦失去了黄河和长江流域,还能否叫做中国文明。当然,有不少海外印度人和海外华人。他们虽远离故土,却仍被视为印度人和华人。这里,种族或生理特征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文明空间紧密相连的文化同一性甚至文明空间本身却是更为关键的因素。随着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重新崛起,恢复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海外印度人和海外华人对位处特定空间的印度国家和中国国家的认同势必进一步加强,他们身上的“印度性”和“中国性”也将进一步加强。这里的“印度性”和“中国性”不是随波逐流的浮萍,而是扎根于地缘印度和地缘中国之特定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历史文化同一性。

二 使用“地缘文明”概念的理由(II)

现在讨论一下“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话。这是一个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看上去简单,实际上非常深刻。对我来说,“近邻”之所以比“远亲”更为重要,就是因为他恰恰是我的邻居,恰恰就住在我的隔壁或附近,与我有一种空间上的缘分,与我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可能帮助我,因而对我来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在